专家发言节选 | “时代与学术：中国经济学人四十年回望”研讨会暨《田国强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

**编者按**：2018年12月29日上午，“时代与学术：中国经济学人四十年回望”研讨会暨《田国强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召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主编陈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季卫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上财人事处处长、经济史学系主任程霖教授，上财法学院教授、上财浙江学院院长马洪，上财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教授，上财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昉教授等专家代表对田国强教授多年来在学术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及在经济学教育方面付出的努力给以肯定，对于《田国强学术文集》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围绕“时代与学术：中国经济学人四十年回望”这一主题，学者们畅谈了自己的观点，发出中国经济学人对于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深刻思考与声音，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黄磊、《学术月刊》副编审沈敏等也参会做了发言。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金福林主持。

**金福林**：各位老师，首先，我代表主办方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对各位今天参加“时代与学术：中国经济学人四十年回望研讨会暨《田国强学术文集》发布会”表示欢迎。田国强老师来到上海财大有14年多，他发表文章的时间（文集里面收集最早是1982年，最近是2018年）差不多跟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是同步的。田老师比较忙，按说五卷本个人学术文集的发布会，我们要找更大场地，一方面是时间来不及，另外一方面田老师也非常低调，不愿意弄大。我们在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之后，同时又是2018年快结束前举办这样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围绕今天的主题，结合田老师的学术文集出版展开讨论，探讨关于时代和学术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田国强**：各位老师，各位朋友，真的非常开心，也很感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首先代表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对各位老师参加研讨会和我文集的发布会表示感谢，感谢我们上财出版社出版这套文集。**改革开放40年，我基本是全过程经历，我是1976级工农兵学员，然后进入高校任教，早期没有太多关注中国问题，真正关注中国问题是出国以后，我以前是学数学，之后学计量经济学。出国以后我有两大感受，我也在很多场合提到过。首先是震撼，我出去的时候中国非常穷，我当时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拿的是每个月42元的工资。到美国去，我的奖学金是800美元，翻了非常多倍。到美国后就感觉美国怎么这么富强，当时高速路我看了以后很震惊，高速公路上面可以跑飞机，道路都铺了快一米深。当然，大家知道我们发展也很快，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几年当中，中国高速公路也修建了很多。第二是痛苦，中国人在过去几千年当中GDP各方面一直都在世界前列，为什么在过去100多年或者鸦片战争以来，甚至是过去500年，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不多？为什么中国近代以后一度那么贫穷？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那时出国的留学生大多非常关切中国的发展。

我们今天的主题也非常之好，今天我把会议的消息发到一些群里面，包括林毅夫教授等不少老朋友也表示祝贺。**所以说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尽管所研究的领域、主要学术观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在关心中国的崛起，对于国家发展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一样的。**今天大家畅所欲言，作为经济学人对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大背景进行讨论。

我个人出国之前主要是学计量经济学，在这一领域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在1982年中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上宣讲，我记得当时张守一、茅于轼、史树中、杨小凯、何炼成、张维迎、刘世锦、左学金等许多后来成为知名人士都与会了，其中我和茅于轼、杨小凯和张维迎还是在一个讨论小组。从那时候一直到今年，我的大多数文章都收集在这套文集当中。我这个人可能是思想比较固化，自从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30多年来，我基本的学术观点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有些小的或者不是非常大的调整。我一直以来是非常支持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这些方面没有变化。

对于学术文集的发布，金社长一开始提议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文集发布会，我说我不够格，我不像吴敬琏老师他们这些前辈，对中国改革从早期就作了许多建言。我非常感谢出版社这些年从马院长、黄磊总编、金社长，编辑李志浩、陈明老师等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今天参会的嘉宾，出版社问我的意思，我定了个标准，首先肯定是我认为很有思想的，并且是有理想，有情怀，学问做得很好的，同时跟我个人都是一样关心中国改革发展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战友。所以，我们今天在座有很多是我几十年的朋友。

季卫东是我认识最早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认识了季卫东教授，很佩服他的学识，他的法学造诣很高，是当时在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数一数二的佼佼者，他是在日本留学读的法学博士，不光研究国外法学，对中国的法学思考和研究也很多。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开过几次会，都对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的全球化有高度认同。

再早一点的是陈昕先生，我们两个早期就一起合作，共同努力编辑出版了14本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刚过，我正好是当年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就和时任副会长易纲教授策划了《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这套书，最后找到了陈昕先生合作，我是主编，易纲是副主编，出版了这套书。当时陈昕刚就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不久，请了汪道涵审阅了这套丛书的总前言，汪老非常重视，亲自对总前言进行了修改，当时在上海、北京和武汉开了三个很大新闻发布会，层次很高。在上海的丛书新闻发布会汪道涵出席这个发布会，还有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和宣传部长金炳华等人出席，在北京的发布会来了几个人大副委员长及学者于光远和黄达等教授。我们当时给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都赠送了此套丛书，随后拿了四个大的图书奖，包括中国图书奖。所以，可以这么说，陈昕先生是非常敢为先的，有很大的魄力和前瞻性眼光，在那时出版国内第一套介绍市场经济学的这么一套丛书，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很佩服陈昕先生的胆识。我们基本是以文会友，在一起共事，但我们做的这些事都是希望促进中国改革发展。通过陈昕，我也和王战、王新奎等人认识，进行交流。

我和张军至少早在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认识，随后一起开过不少会，包括2000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的关于WTO的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年我到了上财以后，在上财又结识一大批一批志同道合的领导和学人，包括在座的程霖教授、刘小兵教授、金福林社长、王昉教授和陈旭东院长助理。程霖教授和王昉教授是我来上财后的经济学院前后两任党委书记，在学院的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及治理等工作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其实我和小兵教授之前接触交流不多，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我们有了微信群以后就交流多了起来，发现有许多共同的学术观点。我和小兵平时交集不多，甚至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误解，大家可能觉得我是研究现代经济学，可能有些洋化，他研究国内问题比较多。其实隔行不隔理，在学术思想、研究和做人做事方面，我都很欣赏他，特别是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在为国献计献策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学者，那作为学者就是要提供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经验方面的分析。

我们在场的媒体朋友，包括《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对我们学院、对我个人一直都很支持。沈敏老师和《学术月刊》支持力度很大，近年来我在《学术月刊》发表了五六篇文章，几乎每年发一篇。

我们在上海的学人，跟现实政策相隔不是太近，北京的学者上午接到一个电话，下午就能去中央参加座谈会，我们这边距离的原因就没办法做到此点，这也使得我们可以更全心投入到相对长远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去。总得来说，就是感谢大家的光临，学术文集还不是很成熟，但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能从中看出来，我的学术思想在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也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展有所调整，但是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经济自由化、民营化，是我这套书里自始自终的观点。在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下，我更加坚定，中国必须形成深层次制度改革，否则政府会越来越多主导，真正会形成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局面，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仅仅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即使加上宏观审慎政策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关系，这五点是我几十年在学习和在开展工作中深刻领悟出来的，并且时时刻刻用来作为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标准模式，这五个维度可以用来考察一个单位的发展，一个学校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但我们实际上做得很不够，只是部分，没有综合统筹系统地考虑，政策在某个方面解决问题，但是造成更多问题、更大问题，影响到其他方面。综合统筹系统考虑对搞管理、做大事业，将事情办成异常重要，但无论在改革、发展及制定政策的国家层面上还是在一个单位层面上都远没有引起足够、高度的重视，我想一个原因是人们以为每个单一要素都有人强调过其重要性，综合起来没有什么新意，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不然，技术或管理创新基本都是组合创新，如何综合治理就是一种全新的组合创新，并且是极度重要的创新，否则做事情就会出现短板，有短板就会做不成事情的。我觉得学术的力量是无限的，我们学者应该秉承和坚守的底线是：我可以不说，可能不敢说、不能说、不方便说，但是要说就说自己的真心话。谢谢大家！

**陈昕**：首先祝贺《田国强学术文集》的出版，煌煌五卷本，可喜可贺！也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出版这部著作，令人钦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国家和地方，各行各业，都在开展纪念活动，总结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总设计师邓小平。不过，我注意到最近微信上流传的邓小平女儿毛毛的一席话，她说，小平同志说过，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的伟大事业，一切归功于人民。在亿万人民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努力和奉献中，有一个群体所起的作用也是值得一书的，那就是从海外留学回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转型，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田国强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与田国强相识缘于《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石破天惊的南方谈话，被认为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第二份宣言书。其中，有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精辟而睿智的谈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当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任总编辑，学习小平同志谈话后，萌生了为国内读者出版一套普及市场经济知识丛书的想法。正在此时，远在美国留学的史正富和贝多广先后致电与我，告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打算编写一套全面系统介绍市场经济学知识的普及丛书，他们将分别撰写其中的两本，希望我能支持他们的想法，承担起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不几天，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田国强和副会长易纲分别致电于我，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编撰想法，表达了合作的意愿。我们之间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田国强是这套丛书的主编，为这套丛书的编写起到主要作用。1992年中，这套丛书在北美经济学人中征集写作计划，有40多位学者提供了30份写作计划，最后编委会挑选了16份写作计划。初稿完成后，编委会又组织20多位专家进行匿名审稿，最后调整为14个选题。田国强在这套丛书中与张帆合作撰写了《大众市场经济学》一书，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他还为这套丛书撰写了总前言，系统地介绍了现代市场经济学的内容和结构，作用和机制。这套丛书赶在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全国第一套关于普及市场经济知识的丛书，承担起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普及的重任。这套丛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发行了40多万册，先后获得了包括中国图书奖在内的全国和省市的诸多奖项，成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时代的社会经济转身的历史大潮中一套值得纪念的出版物。从这套丛书编辑和出版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田国强等留美学子的家国情怀和拳拳报国之举。

这套丛书的意义还在于为海外经济学人在国内建立了声誉，促成其中一部分最有希望者回国效力。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后来活跃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岗位上，最典型的是易纲成为了央行行长，田国强也长期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

要评价田国强的学术地位和贡献，需要认真阅读他的文集，没有阅读就没有发言权。不过可以谈一下我的感觉。田国强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在机制设计理论、动态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领域均有建树，在国际英文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数名列中国经济学家前茅，这奠定了他在中国理论经济学界的地位，很少有人能在这方面与他相提并论。但在改革经济学方面，也即在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敏锐和把握上，有一段时间，主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那几年，偶尔读到田国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总感觉与现实似乎隔着薄薄的一层。这可能与其长期在海外学习和任教的经历相关，主要是通过文献进行理论研究，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使其无法深入到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去观察。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和假设的基础上的，这些前提和假设会因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况出现偏差，导致原有的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现实问题，进而呼唤理论创新。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要有历史的、具体的观察和分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随着田国强回国任教，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在不断深化，从他的文集的目录可以看到，他的研究涉及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前不久读到几篇他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方法和工具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的文章，其中既有大量的数据和案例分析，也有不少真知灼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田国强的成就还有很多，比如他在经济学教学改革上所进行的探索，这里不再一一叙说。

最后想说的是，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体现在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诸多方面，实现了国际标准化。新一轮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潮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层出不穷的问题，为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祝愿田国强教授在新的征途中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

**张军**：今天因为我们复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是首届的论坛，上海市宣传部、社联都去了，这个会要开一天，所以我致辞以后过来了。首先这套文集发布是一个大事，要祝贺田国强教授。我进学院门的时候在想，如果在2002年、2003年我来了上财经济学院做院长，田国强他肯定很重要，但是不见得在财大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答应了上财，几乎就要过来，但是在最后一刻，当时我们学校党委书记找我，他说“不可以走”，一些事情也进行了协调，所以最后就没有过来。今天我和燕爽见面，当时他是副书记，来我家深谈了一次。所以我说这些事情很有趣，我今天赶过来的路上就想了，如果我那个时候来，没准田国强就去了复旦，所以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选择。但是上财应该要感谢老田，他来到上财，让经济学在中国的高校当中办学的一套体系走向了规范化，复旦经济学院也是从老田这儿学到很多。 一转眼四年，我担任复旦经济学院院长的时候，也在默默地向老田学习，他们也有一些年轻老师最后到了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既是竞争对手，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上海滩两家靠得最近的两个经济学院，我们当中有很多交集、有很多合作的领域。所以，我要感谢老田，因为他到了这里，风生水起，影响了我们隔壁的复旦经济学院。因为老田在上财的这些年，我们也进步很快。刚才陈昕总说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问题，现在大家心目当中一个田国强，一个厦大洪永淼，武汉本来还有邹恒甫，他现在基本退出江湖，基本是洪永淼和田国强，所以我感觉对中国的经济学的教育，老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谈谈一点感受，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海归确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现在像老田这一年代的海归，有两拨人。一拨人进了政府，刚刚谈到了易纲，谈到了方星海，方星海他年纪轻但是出道比较早，他是复旦附中毕业，和复旦有一定的关系。他有一次在美国见了复旦杨校长，杨校长想请他回复旦，他不是复旦毕业的，他是复旦附中毕业的，他当时动心了，跑来和我聊了一下午。这样的一批人，政府里面还有很多。第二拨人像老田这样，一方面把现代经济学的这套基础知识引进到中国学术界，我个人早年也是看到，刚才陈总讲到的那些书，我印象特别深，所以我跟老田相识也有20多年，在1993年见过一次，后面陆续也见面，所以相识有20多年了，对老田的学识各方面还是比较关注。这两拨人在40年当中，特别是前20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新的海归，包括财大、复旦，每年会引进很多年轻海归，现在年轻海归总体上只关注他们的研究，这些研究当中有一部分跟中国有关系，有一部分没有关系，所以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反过来也是像陈昕总讲的，也在推动中国学术发展，所以我们学术走完了转向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现在要让中国的学术真正地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要靠更年轻一批人。最近加入我们经济学院的樊海潮和李志远两位学者，获得了很多荣誉肯定，他们两位中，我和樊海潮也在合作，他发表国际A刊量在复旦创下了记录，他现在有30几篇待发表，有相当多的是已经被国际A刊接受了，所以我们感觉到现代这一批年轻人，他们在比较专业的领域当中已经开始把中国的问题推到了国际的学术界，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学术依然在作很大的贡献。

所以，这40年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当年我们要开始更多地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东西，到之后我们可以在国际上最顶级的期刊发表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用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也就是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这个转型跟中国经济一脉相承，我相信在科技界也同样如此。我最近接受澎湃采访的时候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周培源先生，他来复旦作报告，我记住他一句话，他说在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已经看不懂国际物理学界发表的论文，所以当时我很吃惊，因为他是爱因斯坦的学生，地位这么高，他不懂国际期刊。之后苏步青苏老在上世纪80年代讲过，他在数学系说，以后不要再请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因为我完全听不懂。所以我觉得，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这些老先生虽然早期留洋了，但是后来封闭了太久，中国的学术远远落后于国际学术界，现在经济学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相信我们的科技界自然科学也好、工程学也好，跟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在经历这样的转型过程，经济学或许是走得比较快的领域。

我觉得今天老田能够出版五卷本，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脑子里面田国强是数学家，他发表的英文论文跟中国没有关系，但是他的中文文章全部直接间接都是关于中国，他基本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扎根在美国，在那个领域当中有非常好的研究，同时他关心中国，他这样的模式其实在国内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学者，比如说有些人一开始就研究中国问题，只不过从理论上研究，林毅夫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中国农业问题，所以他回来以后野心更大，希望基于中国的经验改写发展经济学。所以我觉得老田这样的模式不是很多，我认为他在他所处的条件下，这是他非常好的选择，基于他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在很多方面，我觉得老田对中国的看法，就像刚才陈昕总说的，他是用经济学最基本的东西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基于中国在标准模式上的偏差，提出他相应的改进或者改革的建议，所以他总体上是坚持了这样的研究方式，对中国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跟老田可能看法也不一样，我们有两次在一些会议上发言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一些看法不一样。譬如说，老田更多的是看到长期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有的时候眼光拉得太长，不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还要关注短期，因为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日本，包括战后的“四小龙”，都是在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里超速发展起来的，不是漫长的演进过程，就像上海的高楼大厦最早在一二十年里面比较集中起来的，跟欧洲不一样，欧洲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所以在中国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短期不见得不重要，短期也很重要，很多事情短期不处理好，无论是福利水平、无论经济增长、无论是资本的形成，都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短期和长期总是互补的，长期的问题需要像老田那样有长期的眼光，从基本的制度到市场化的方向，实时地提醒中国的改革者不忘初心，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也需要我们更多关注短期很多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经济学在中国的背景下，它的用武之地远远要大于西方的发达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学者一直有参与的机会，我相信在参与过程中，大家也都有巨大的收益。我们可以去通过调研走进真实的世界，我们也可以像老田这样用标准模式来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方向，市场化的方向，我们也需要凯恩斯，从短的角度研究中国的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经济在这个阶段上可以容忍具有不同视野、不同的时间长度、不同背景的经济学人，大家共同发挥各自的长处，能够合力推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等到我们退休，韦森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老田还没到，我差不多还有10年，如果到65岁退休，差不多还有10年，所以差不多就是10-20年时间范围里，如果回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回望我们在最近这些年的讨论，应该非常有意思。中国今天就是在这种讨论当中，我们很悲观，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15年、20年以后，我们还是发现中国经济在磕磕绊绊当中又上了一个台阶。

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或者希望。我提出这个看法跟老田和在座的各位共勉。谢谢大家！

**程霖**：我今天说两点：第一，我很荣幸和田老师共同在上财平台上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作为协助者，共同走过这些路，非常荣幸。第二，我是做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所以我从历史发展角度谈一些想法。

从我的专业角度考虑，我个人认为田国强教授可以说是当代我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我国当代经济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和践行者。可以说，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发展，绕不开田国强，也绕不开在座的各位，包括张军教授等等。学术文集的出版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个工作为我们研究田国强教授的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我也注意到对文集他作了非常精心的安排，通过编排非常好、非常清晰地呈现了田国强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或者重要的学术特点和创新。田老师的学术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两大块，一个是经济学研究这一块，还有就是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改革，主要是这两个大方面。

从第一块来说，又可分为三部分贡献。一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原创性工作，发表了80多篇高水平的英文论文。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发展、创新方面作出了非常独到的贡献，《市场经济普及丛书》发表等，包括早年对赫维茨教授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了非常大的贡献。三是利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转型中的体制相关的问题方面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而且他强调的是理论假设、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的结合，因为在方法方面他比较科学，因此，他的很多研究观点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有很多创新点。服务社会方面，很多对策建议被中央国家及各部委采纳，在实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经济学者，我个人的觉得田教授是表率，他胸怀理想，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面，既能够对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同时又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创新，代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方面。

从第二块来看，田国强教授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改革方面，作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其中，非常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从2004年开始推动海外优秀人才的成规模、成建制的引进，而且过程中实现了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常任轨制度，一个评价体系的改革。钱学森曾经提到，新中国建国以来，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跟我们体制有关系，我们的培养体制短平快，我们把常任轨制度引进来以后是很大的创新，因为常任轨有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早期竞争择优与晚期职业保护，当年轻精力充沛的时候，鼓励做前沿的、顶尖的研究，取得成果之后，考核会有所放松，鼓励你选择重大的、重要的基础性前沿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研究，一旦出成果将会是重要的颠覆性成果，这种评价机制，我们学校改革时把机制引进过来，在我们学校收到了比较好的成效。二是在人才培养方面，推动了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基础和史学综合人才培养体制、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一系列创新，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科研方面鼓励顶天立地，既鼓励学者瞄准前沿问题进行原创性研究，同时又对接经济改革发展当中重大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国家经济发展献计献策，推动我们的科研体制发展和科研的创新。在管理体制方面，推动教授治学规范化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经济学的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中国的经济学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时间关系就不展开说，主要是对文集的出版表示祝贺！

**韦森**：我刚从北京回来。今天的会议我一定参加，虽然我和田国强兄认识得很晚，但是我们的许多观点看法都是一致的。但是，在之前，我一直认为国强兄主要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发文章。今天拿到这五卷本的文集我才知道国强兄在中文中也发表了这么多东西。尽管我们认识比较晚，你老兄近几年发表的每篇文章我都看。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再对这五卷本的文集做任何评论了，今天我讲另一个话题，文化观念与制度的生成与变迁。我之所以讲这么一个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国家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今天考虑我们在信什么？然后才能知道未来我们当走的道路。我想这也是我和国强兄我们这些经济学人今天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我在北京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之前的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也讲过。那次会议最后一个分论坛，有我们4个人发言，包括林毅夫、沈联涛、汪晖和我。在那次国际会议上我是用英文讲的，今天在这里我用中文再讲一下。目前，中国社会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明年将会发生什么？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我们真的不清楚。故今天我们经济学人就像田老师说的那样，我们更应该反思一些基本问题。为什么最近我会有这样一些想法？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近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使我们不得不再考虑人类社会的制度是怎么生成和变迁的。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历史中，不同国家、文明和社会总是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制度也不断发生演化和变迁。在现代和当代社会，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有共同的地方，也实际上各有巨大差异，用比较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来讲，不同国家的资源配置体制实际上也有很大差异。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和不同的资源配置体制？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是如何形成、维系、演化和变迁的？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因是什么？这些应该是一些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元问题。

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哈耶克一开始就强调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尽管人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些结果”。这句话的英文原话是：“A change of ideas, and the force of human will, have made the world what it is now, though men did not foresee the results”(1944， p.15)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二卷， 哈耶克也曾说过，“每一种社会秩序都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之上”（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Every social order rests on an ideology”(1976, p.54）。

到了晚年，诺思也几乎达至了与哈耶克同样的认识：制度变迁的最终源泉和动力，取决于人们信念和观念。为了说明这一点，诺思晚年曾发现并创造了许多新的术语，来解释这一道理。譬如，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以及在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思就提出：制度变迁的动力（亦可能是阻力和张力——这一点是诺思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和最终源泉，乃在于人们的“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ructs）”，从而诺思最终强调人们的信念（beliefs）、认知（cognition）、心智构念（mental constructs）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到今天，哈耶克、诺思这些思想家才使我们慢慢明白，人类采取一种什么样方式来组织社会，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政府管理形式、国家如何管理和和治理社会，乃至人们到底如何组织生产、交易并进行收入分配和消费，以及人们选择、接受、顺从按照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进行实际生活，完全取决于人们在信什么，取决于人们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信念。

林毅夫和张维迎在许多方面有争论，但制度变迁的最终源泉取决于人们的挂念和认识这一点他们都一致。

为什么是如此？这是因为人有理性、有自由意志和能进行个人和集体选择的一种动物，人类要生活、生存、交往和延存下去，就要组织成社会和国家，就要通过结合成一定的社会与经济组织，并制定和遵从一定社会规则来进行生产、交往、交易和生活。生活在不同疆域上的人类群体要组织成国家以及国家要采取什么样的制度，那就要取决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们相信什么、认为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于是，在人类社会漫长历史演变中，在不同的疆域上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和国家，也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慢慢形成了一些观念，也同时演化生成了各国的不同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在世界各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西方思想界开始理论地系统地讨论一些人类当如何生活和生存的问题，一些思想家也创生出了人类当如何生活、如何生活会更幸福的理论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慢慢被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于是就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制度变迁，在西方各国慢慢建立起了现代的政治、法律和市场经济制度。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存在的社会制序，主要是根据一定的理念而建构出来。当然，在人类历史的演变史上，一些按一些意识形态创造型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个人的理念所构建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在社会的实际建构时可能会走样，在现实的制度变迁中一些错误的理念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实行而不断地为现实所修正，因而会发生一定的变异，即使能按照一定的社会理想模式将其付诸实施并建构出来一定的制度，但因为这些政治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制度并不符合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而导致经济衰退、官员腐败、社会衰朽而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制序解体。这就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开始非常强大的帝国或国家灭亡或解体了。

在人类历史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元帝国的最后分裂和解体，都是一些历史上的例子。即使在当代，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制，也都是些鲜活的现实例子。如果大范围的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在生活在不同疆域上的人们的共同认识和信念，尤其是夺取和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和集团所提出的一套信念，决定了一定时期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不同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其制度变迁，从根本上来看取决于一定时期为大多数人尤其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所信奉和创制出来的一些理论信念。当社会的大多数人的信念发生了变化，那个社会的制度变革也就会到来了。

不但在整个社会体制上人们的信念尤其是夺取并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和“ideology”的创造者的信念会影响乃至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法律制度的整体式样，甚至在一个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些社会的、宗教组织的乃至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的一些信念，也会直接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演变，最后也会影响乃至决定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路径。我们复旦的方钦博士最近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新书《观念与制度：探寻社会制度运作的内在机理》在这部多年研究的专著的第3章，就探讨了远古社会中的礼物交换与产权的关系，发现“产权观念就是伴随着原始宗教的思维模式而起源的。正是由于物品上携带着人的本质的一部分——这是比任何世俗力量都更为强大的超自然力量，产生了对于所有权观念的朴素理解”。

但是在古代中国，在西周时期的《诗经》（1100-600BC）中就记载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观念，如上所述，接着在传统中国社会就一直没有真正的刚性的私有财产制度。那么中国古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谁先提出并被中国古人所接受的？现在也无法考证了。现在我们只能说是在远古中国社会中慢慢演化出来的。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信念或言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是“大同思想”（great harmony）和“天下为公”（the world belongs the all people）。

在如此传统中国文化信念下，自西周开始，在传统中国社会就没有真正的私有制。中国一位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1954就提出了一种“王有制”的观点，认为“君王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后来，当代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则认为，过去我国史学界所认识到的那种传统社会的“私产”现象，实际上只是“私人占有”，因为在皇权之下，没有任何个人——豪强地主或自耕农——能够防止政府权力对权利的掠夺。缺乏制度保障的“私产”不能称为“私有制”，其实质仍然是“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另一位历史学家程念祺在一些著作中也持相似的观点。

实际上，在1987年发表在《东岳论丛》上的一篇文章中，我当时也提出过：“在两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中国就曾出现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有经济’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财产归属观念，在西周之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屡屡出现社会的大动乱和王朝更替，经济政治制度也发生了一定的演变，但总的来看，王朝官僚政治机器一直对经济过程有着超强的一体化的控制力量。以至近代工业在中国萌生出现时，其主体形式也基本上是官办和官商合办经济。民国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更主要以官僚资本占主导地位并为其基本特征。因此，除了从理论上说我们今天的国有是劳动人民的公有从而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亲国戚、官僚地主的私有有着本质区别外，仅就形式而论，‘国有’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从这一点上来看，建国后我国之所以能从国外移植来一套高度集权的统制经济运行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相适应的国有制这种虚所有制的潜构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中都有它的遗传模板”。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体制是一个传统中国文化和Marxist ideology and ideal of future society （communism or socialism）的巧妙结合，这是没问题的。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资源配置体系实际上都建立在一定观念之上，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思想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诺思本人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所撰写的《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曾指出，在古代和传统社会中乃在近代和当代的社会中，一些原创性的思想家如Socrates、Plato、Aristotle、老子、孔子、Karl Marx等，以及像Jesus、Muhammad、Sykymuni (buddha)这样世界三大宗教的创建者，乃自像Lenin、Starlin、Khomeini、Mao等这样的国家领袖和思想家，会原创性地提出某些思想和学说。这些哲学家、宗教的创始者、乃至国家的首领在原创性地提出某种思想和观念之后，通过国家的政府科层、宗教组织、政党、信仰和社会团体中官员、神职人员、信徒在社会中进行传播，并在历史过程不断被他人进行新的解说，就在这种传播和解释中形成了某种观念和信念。这些信念又通过一定人类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文化濡化、文化传播机制把某种信念（如儒家的“三纲五伦”教义）理解为当然正确的，而这种被信以为当然正确的信念，又反过来支持并构建了某种国家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

除了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这些如诺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创造者提出某些观念外，实际上许多关于人类社会如何组织成国家，如何建立政府，如何进行生产、交易和生活实际上也是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中慢慢演化出来的。譬如，市场经济的私有财产观念，在西方社会中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私有财产观念从何时产生的？按照法国学者 Fustel de Coulanges 在the Ancient City: A Study on the Religion,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 （Lee & Shepard, 1877. The Origin of Property in Land (Sonnenschein, 1891) 两本书中曾发现，西方社会的“私产的观念出自宗教本身”，土地是以宗教的名义而成为了家庭的私产的，进而“大多数远古社会所有权的建立，都是由于宗教的原因”。

另一个例子是西方各国今天所实行的代议制的民主制度，其起源在什么时候？是怎么产生的？研究古代西方政制史和政治思想史的学者都发现，代议制民主政制的观念大致产生于欧洲中世纪（古希腊的城邦国如雅典的民主政制还是直接选举）。研究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先躯 R. W. Carlyle 和A. J. Carlyle的六卷本的《A History of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 》一书书中以及另一位研究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的专家W. Ullman 在其《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中，对中世纪的民主思想也有深入的阐述，按照他们的研究，代议制民主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形成的，但其思想源头却是日耳曼人(Teutones tribes)的部落民主传统，并同时汇合了希腊城邦民主传统和罗马共和传统，故可以认为这一思想或言观念是在欧洲中世纪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in der ganzen Ideologie）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熟悉马克思的经济与社会思想的我们都知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史观，这一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有了其理论雏形。尽管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一开篇，马克思说：“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为何物或应该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物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中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象、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groaning）。我们要起来反抗这些思想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页）。

马克思的这些话是在19世纪中期（1845～1846年）说的。现在，人类诸社会都走到21世纪了，在一些国家和社会中，人们与某些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否还是如此？正因为此，研究观念与制度的关系，以及探究什么样的观念和什么的制度才是正义的和最能增进人类福祉的，就变得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了。

今天我借田国强教授的新书发布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错了请大家批评。谢谢！

**季卫东**：今天能够参加《田国强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暨纪念改革开放40年回顾学术研讨会，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要祝贺国强兄。他的五卷著作200万字，是知与行的心血结晶。他是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和海归的代表者，他的学术生命与改革开放是同行的，因此，他的成果集大成出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和国强兄相识于1992年的春天，在美国纽约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国强兄显得意气风发。他在美国学术界很活跃。我从日本过来参加学者的交流活动，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在学术组织方面非常有才华。他组织过各种各样的讨论会，参加者都是跨界的。当时经济学界的参加者有杨小凯、周其仁等等。听他的发言能明显感到他的家国情怀，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刚才陈总提到了国强兄主编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这套丛书，那时反响是非常大的。

国强兄曾经担任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他回到上海后在2006年把留美经济学会的年会放在上海、放在浦东干部学院召开。那次他邀请我从日本来参加会议，从法律的角度谈了些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的看法。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国强兄谈到了他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关于推动经济学研究的设想，非常令人振奋。那个时候上财的改革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在国内也声名鹊起了。同时，他也跟我谈到了为什么从北京到上海，对我触动很大。我后来回国时选择来上海，确实和他的这一席话有关系。

我刚来上海时，还不太熟悉环境。记得当时正好财大主持召开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研讨会，国强兄发出邀请让我参加，我顿时有找到组织的感觉，在那个会上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后来《文汇讲坛》邀请我谈司法公正问题，也邀请了国强兄作为经济学家去与我进行跨界对谈。由此可见，田国强对制度问题一直是非常关注的。

从学术上我对这套书没法做出专业的评价。我要回去好好拜读。但是我看了目录，也关注了国强兄近期的讨论，包括在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的讨论。我认为他的观点非常理性，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在具体细节上没法做出精准的评价，但是感觉国强兄学术成果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研究的种跨度很大，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另外，他一直坚持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持续地、大量地发表高质量论文，确实是比较难得的。大部分人往往只侧重中国的问题，但他既在主流经济学界发声，同时也对国内经济改革发表见解。根据我的理解，他是从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寻找问题意识，推动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同时又在普遍性的理论方法和框架下来观察中国问题。他所研究的内容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涉及经济学各个方面。这种观察和论述的能力好比直升飞机，可以飞得很高、纵览全局，同时也可以降到低层来审视细节，研究具体问题，很接地气。总而言之，在主流经济学与中国的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之间不断进行对话，在宏观与微观之间不断进行研究视角的切换，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素质，也是国强兄的学术特征。这种方法不仅对于经济学具有意义，对于法学也同样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他回国之后，还是坚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发表文章。对比起来我觉得有些惭愧。我回国后做了10年的院长，在今年3月份卸任改做其他方面的工作。我虽然也试图坚持认真做研究，虽然每年也有一些文章发表，但是很难大量的产生，长篇论文很少。由此可见国强兄在兼顾行政和研究方面的确取得了难得可贵的成就。能做到这样，一方面反映了他的才华，另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刻苦精神。

在教育改革方面，他的努力是有跨学科意义的，非常令人瞩目。他引入了评估体系、教学方法等等一系列改革，对中国教育界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力量，使得上海甚至其他地方的大学改革和发展都借鉴这个模式，包括张军教授刚才提到复旦大学借鉴这个模式，使得国际化加速。另外，国强兄对法律或法治的关注，也体现了他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意识到了中国没有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很难继续走下去。对于我们法学界来说，经济学界在法治问题上达成共识，支持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这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支持。谢谢！

**马洪**：我简单说一下，当时我来出版社以后，发现很多本校的专家作者在外面的出版社出书，非常痛心疾首，尤其是像我们田老师这样一流的经济学家，他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竟然在人大出版社出版，我知道后真是心如刀绞。2015年我在北京参加社长培训的时候，就田老师《高级微观经济学》一书去找过人大出版社，所以这次田老师要出版学术文集，我们财大出版社一定要作为重大选题，包括按照最高的质量标准来出版，所以要感谢李老师把书拿下来，也感谢田老师。我在财大工作30年，所以田老师的改革历程我是亲历者，财大从很一般的学校发展到今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田老师加盟，他以超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推动了整个财大国际化水平，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一流学者、一流研究，用一流的正规方法研究问题，刚才几位经济学家讲了。

第二个是教学，我长期担任法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从2004年开始每年我们都要讨论每个学院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田老师来了上财以后，上财的教学改革明显变化了，并且影响了全国的经济学教育，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所以你这套书如果不在财大出，是非常遗憾的。我再次对田老师对文集的出版表示祝贺和感谢！

**刘小兵**：首先，非常荣幸能够参加研讨会，感谢田院长！感谢出版社的邀请！我是后辈。

第二，对田院长这套学术文集的出版表示祝贺！当然，我也相信这套学术文集对我们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就像田院长在上世纪末编的那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一样，我希望它能够发挥作用。应该讲，那套丛书影响了我们这一代，我读研究生开始到后面留校以后，这套书对我们影响很大，包括前面21世纪的那套书的影响非常大，我也希望田院长能够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继续活跃，这是我良好的希望。

第三，关于刚刚各位讲的内容，说实在的，心里非常有感触。刚刚季老师说经济学界对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贡献很大，现在对中国的民族、政治的进程贡献更大的是法学界。经济学界对经济改革发挥了很好的效果，祝愿我们不管是法学界还是经济学界，包括其他社会科学方面学界，能够像以往一样有比较宽松的环境容许我们继续做研究，我们也会遵守纪律，还是希望一如既往给我们宽松的环境做研究。我一直非常敬佩田院长，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地鼓与呼，同时为经济学教育改革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最后，祝愿田院长能够在中国的研究和他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这也代表了我们的期望。再次对田院长表示感谢！

**王昉**：我简单说一下。首先祝贺田老师！田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旗帜，当然田老师不仅是经济学家，他同时也是教育家，更是非常优秀的管理者，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包括做学问、做人、做事情等方方面面。田老师有很强的家国情怀。很多人来我们这边调研，田老师不在的时候我都介绍他是非常有报国热情的学者。田老师在学术上的建树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刚才各位专家已经介绍了，以前我们说胡寄窗胡老是古今中外兼通，今天听下来，其实田老师也是的。我是财大土生土长培养起来的，其实是一直受田老师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理念感召，某种意义上是他的追随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也是我们学院学校这么多年来改革发展的受益者。

其次，田老师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并强调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结合。无论在人才培养，还是在科学研究中，包括在我们今天下午即将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年度报告，都强调“三位一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历史的视野来审视问题，田老师自己对经济思想史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也招收过我们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生，他对司马迁的治理思想，对于孙子兵法，对于近代企业争论，都有自己的研究见解，强调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所以，从史学的研究来说，他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最后，我祝田老师学术之树常青，希望他的文集继续出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谢谢大家！

**黄磊**：不久前，从中央到地方，都举办了庆祝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其中的许多场合，多以宏大的视角出发，将这40年的历程描述为一副波澜壮阔的画卷、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今天，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人、一本书，见微知著，从经济学和经济学人的视角出发，来回顾和呼应这段历史，就显得尤为生动和鲜活。

这个人就是田国强教授，这本书就是《田国强学术文集》。

这本书不仅是田教授以往个人学术生涯的总结和实录，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的实录。

30多年来，田教授一直在海内外从事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并对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制度转型保持密切关注和研究，提出了许多直率的真知灼见，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学术境界。

如前面的专家——程霖教授、马洪教授所言，田国强教授来上海财经大学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后，积极推行与国际接轨的教学科研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学科走到全国的最前列，并在国际上建立了相当的知名度。在田教授的努力下，上财的经济学进入国家“985”优势学科阵列，带动上财的教学科研发生了质的飞跃。

田教授的这段经历，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所折射处的闪光点。

作为上海出版界唯一一家的经济学出版中心，作为时代文明的传播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深感有必要，将田教授多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出版。因此，也就有了今天的这套《田国强学术文集》。该书被列入上海市“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得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重点资助，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是田国强教授迄今为止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比较完整的回顾和总结。

这套文集共收录了田国强教授的138篇中文文章，近200万字，分为五卷八篇。在历时2年的编辑的过程中，从出版社的管理层，到本书的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都与田国强教授及其助手陈旭东老师，充分沟通、广泛搜集、详细订正、认真编校。本书的装订由全国知名的装帧印刷企业雅昌公司承担，印刷期间，策划编辑、责任编辑和美术编辑几次下厂，保证了本书高标准的出版。

文集中的许多文章紧密围绕中国改革与开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的研究，紧紧抓住“市场化制度改革”这一主线。大部分论文均着力探讨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在相关领域内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提出一些战略和政策上的建议。田教授关注中国经济问题已有35个年头。田教授在序言中提到，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中国经济问题，在留学生间开展讨论，可以从晚上6点，一直争论到第二天的早上八九点。在我审读这些文章的时候，能够深刻感受到田教授浓厚的学以致用、经济匡时的家国情怀。本书中体现的研究和相关的成果，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此外，正如王昉教授所言，田国强教授的这些文章具有深刻的历史视野，同时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在坚持经济学基本范式的前提下，既坚持科学性和严谨性，又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充分考虑经济学原创性纯理论研究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差异，较好体现了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的结合。

这套《田国强学术文集》，不仅是个人的一次学术生涯回望，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生动例证。他以经济学的视角，窥斑见豹式地从一个学者的视界，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何以能够从无到有、筚路蓝缕，直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光辉历程。该书不仅是总结过去，而且也有益当下，更可以为未来提供进一步的启迪和思考。

以上是我从财大出版社编辑的角度给大家作了介绍。谢谢！

**沈敏**：今天非常荣幸能参加田老师学术文集的新书发布会，田老师对《学术月刊》、对我的帮助很大，首先祝贺田老师这套著作出版！这本巨著体现了经济学大师的学术生涯、思想轨迹及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我们学术界提供了一场思想盛宴，也从侧面记录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田老师在书中的很多论述做出了前瞻性、引领性和开创性的贡献。

一直记得田老师曾在多个场合呼吁：立有学术的思想，做有思想的学术，所以这本文集里面很多文章，其实是对这个理念进行了很好的阐释。田老师给我的印象有两点比较深，一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在学术上勇于争鸣、也敢于争鸣，而且他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二是他的很多观点有前瞻性，我记得有一次开会时遇见他，他就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很多我们已经都讲过了，事实上当时他在《学术月刊》上类似的观点和内容已经刊发，所以他一再强调，经济学家理论建言要先行，要有预见性。

非常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学术月刊》写了很多文章，尤其是他把非常厚重的精华文章在我们这里首发，这是我非常感激的。希望田老师今后能够继续支持我，支持《学术月刊》。再次表示祝贺！ 谢谢大家！  （**完**）